

·研究综述·

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得与失^{*}

——围绕国内学术界三大争鸣的政策效应评价

陈 林 万攀兵

【摘 要】文章分别从教育发展、社会公平和人口红利3个视角综述了国内学术界关于高等教育扩张政策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展示了正反两方各种观点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从现有研究的结论来看,扩张政策既可能通过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促进人才培养多元化推动教育发展,也可能通过降低教育质量和催生过度教育现象损害教育发展。既可能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推动人口城市化增进人口红利,也可能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和加剧人口老龄化减少人口红利。而在扩张政策如何通过影响教育公平和收入不平等进而影响社会公平这一议题上,学界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观点。高校扩招是好是坏,得失之间孰轻孰重?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但总体而言,学界对高等教育扩张政策效应持负面态度的占优。文章认为,扩张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坚持两点论。

【关键词】高等教育 高校扩招 教育发展 社会公平 人口红利

【作 者】陈 林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万攀兵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 言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之源,而高等教育又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初等、中等教育的师资水平,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居民就业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等,均受到了本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决定性影响。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受到两次较大的政策冲击。第一次政策冲击及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缓慢的恢复期,1985年的教职工数比1976年增长98.0%,年均增长7.9%,1998年又比1985年增长45.1%,年均增长2.7%;1985年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比1976年翻了一番多(9年增幅为215.6%),年

^{*} 本文为广东产业发展与港澳台区域合作中心项目“高等教育扩招、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社会转型”(编号:52702497)的阶段性成果。

均增长 13.6%,1998 年又比 1985 年翻了将近一番(14 年间增幅为 91.1%),年均增长 4.7%^①。第二次重大政策冲击是 1999 年推行的高等院校扩大招生,使中国高等教育的缓慢恢复期戛然而止。1999 年至今,中国的专科以上学历人口年均新增 41 万多,大学每年招生数量翻了近两番,年均增速高达 11%。截至 2014 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数量为 2 529 所,在校生规模为 2 732 万余人,分别增加了 1.4 倍和 5.3 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高中升学率则分别提高到 37.5%和 90.2%^②。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增速来看,这次政策冲击导致的结果,堪称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大跃进”(邢春冰、李实,2011)。

这次高等教育“大跃进”在给经济增长带来福音的同时,似乎也损害了教育发展和社会公平。一方面,受益于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迈入大众化时代,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人才培养更趋多元化;每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扎根城市,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也为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储备了丰富的人才。另一方面,伴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屡遭质疑,人才高消费现象频出(余华义、陈东,2006),培养出来的科研人员创新效率下降(陈林、夏俊,2015);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形势让许多大学生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教育不公平问题也备受关注。扩张政策似乎未能兼顾数量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因此,高等教育扩张的政策效应必须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那么,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究竟是否值得肯定,其积极效应和负面作用之间孰轻孰重?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界众说纷纭,甚至针锋相对。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厘清学界在高等教育扩张政策效应上的分歧和总体态度。

二、关于教育发展的争鸣

自高等教育扩张伊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时代。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0%,普通高等院校年招生规模突破 700 万大关,居世界第一。然而,“量”的增加似乎并未伴随“质”的提升。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教育质量下滑、知识失业、人才高消费现象不断涌现。实际上,高等教育扩张是否有利于教育发展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认为,扩张政策成就斐然,有利于教育发展;而另一方提出,高等教育扩张损害了教育发展。围绕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发展问题,学界分别从多个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 正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有利于教育发展

1. 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自 1999 年高等教育扩张以来,中国普通高校平均办学规

① 以上引用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全国指标或各地区指标加总。

② 教育部 1999~2014 年教育统计数据。

模逐步增大,从 1999 年的 3 335 人上升到 2014 年的 9 995 人。随着办学规模增大,生均培养成本不断下降,有助于提高高校的办学规模收益。有学者利用 1999~2001 年的数据实证表明,高校扩招总体上改善了高校产出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具体而言,高校扩招通过节约知识产品交易费用、生均固定成本和促进专业分工提高了规模经济效应,通过健全本科、研究生培养层次推动高校内各项资源的整合、共享,改善了范围经济(刘灿、宋光辉,2004)。与此同时,扩张也优化了学生与教师及教师与职工之间的配置结构,提高了教职工及专任教师的资源利用率,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1999~2009 年,中国普通高校生职比和生师比分别增加了 155%和 29.8%(赵凌,2012)。此外,扩张促使教育结构由金字塔结构逐步转向扁平型结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教育经费投入增长有限的背景下,总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占比大幅提升,进而提高了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这有助于中国教育集约化发展。因此,正方认为,高等教育扩张有利于教育发展。

2. 促进人才培养多元化。高等教育扩张促进了人才培养多样化,极大地推动了专科教育的发展。1998~2007 年,专科院校数量增长速度是本科院校增速的 2.15 倍。2002 年专科招生人数开始超过本科招生人数,其后一直保持招生人数上的优势。这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状况,同时民办院校和独立院校也快速发展,加速了高等教育系统向多层次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任丽婵,2011),扭转了以往“千校一面”的状况。人才培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高校培养出的高层次人才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涉及政治和领导阶层,还涉及社会的各行各业和各个领域(登云、齐恬雨,2016)。专科院校、民办院校和独立院校培养出来的大量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改善了中国单一的人才培养结构,有效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使人才培养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支撑(赵婀娜,2016)。因此,高等教育扩张通过促进人才培养多元化进而促进了教育发展。

(二) 反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不利于教育发展

1. 降低教育质量。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率不断攀升,教育质量趋于下降。由于高等院校入学门槛的降低,入学者的水平差别增大,生源质量趋于下降(张卓、徐峻,2015)。与此同时,生均办学经费投入不够和师资力量准备不足(岳昌君,2013)对教学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平均每名在校生在 1998 年可获得 0.3 名在校教职工的教辅与 1.72 万元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然而到 2011 年却仅能获得 0.1 名教职工的教辅与 2.36 万元^①教育经费的投入(陈林、夏俊,2015)。较低的投入(生均办学经费和生均教职工数)与较高的产出(大学毕业生数)显然无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由于

^① 生均办学经费投入数值虽变大,但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则相对数值下降。

办学条件下降,加之既有的专业不对口、学用不一致等问题,不少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与用人单位要求相去甚远。部分专业毕业生过剩,造成人力资本浪费(尚明彩、丁辉,2010)。总体上,由于经费投入、办学理念、制度建设、社会心理和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跟不上招生规模扩张的快速进程,高校在发展规模与速度、学校升格与改名、专业设置和高校基建贷款方面存在着盲目性,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纪宝成,2006)。

2. 过度教育。过度教育是指个人受教育程度超出了其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杨文奇,2006),其最明显的表征是失业现象严重,社会普遍追求高学历(张军利,2010)。根据筛选理论,高等教育除了具有高层次人力资本的生产功能外,还具有传递求职者关于其个人高能力的信号显示功能。其可以作为有效识别信号的原因在于,高能力者相对于低能力者完成学业的边际成本更低。因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会根据自身能力水平选择不同的教育层次。据此,有学者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展和就业竞争的加剧,部分拥有更高学习能力的人普遍选择获取更高的文凭(如接受研究生教育)来增加自己的就业竞争力(赵立卫,2005),进而出现文凭贬值和过度教育现象(谷宏伟,2009)。从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存在初次就业率低、起薪低和“高知低就”等现象可以看出,中国已出现区域性过度教育的现象(张彦通、赵世奎,2004)。目前,中国的过度教育率高达41.03%(缪宇环,2013)。可见,中国过度教育现象已十分严重。因此,可以认为,高等教育扩张通过催生过度教育现象进而损害了教育发展。

总之,关于高等教育扩张是否有利于教育发展这个议题,学者间尚存在巨大的分歧。而分歧的关键在于缺乏一个统一的教育发展评价标准,以至于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方基于“产出”和“结构”的视角,提出高等教育扩张提高了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并促进了人才培养多元化。然而,忽略了“质量”和“效果”,具体表现为教育质量下降和过度教育,这也成为反方论点的依据。现代高等教育兼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而其核心使命在于服务社会。因此,相对于高等教育的人才“产出”和“结构”而言,我们更应关注其培养的人才“质量”和利用“效果”。由此可见,反方的观点更具说服力。因此,本文倾向于支持反方的观点,即高等教育扩张总体上不利于教育发展。

三、关于社会公平的争鸣

从古代“学而优则仕”到现代“知识改变命运”,高等教育一直以来作为实现社会合理流动的主要手段和载体,寄托了无数底层家庭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然而,21世纪以来,每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涌向劳动力市场,其中不少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大学生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天之骄子”,“寒门出贵子”的故事似乎也再难演绎。不少学者将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指向了始于1999年的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例如,高耀、刘志民(2015)提出,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教育获得机会和职业获得机会更多地被优势社会阶层的子

女所承袭,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叶晓阳、丁延庆,2015),进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然而,钟秉林、赵应生(2007)提出反对意见。实际上,围绕高等教育扩张与社会公平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并从多个方面展开了激辩。

(一) 正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促进了社会公平

1. 促进教育公平。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扩张对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有重要作用(乔锦忠,2008),因为随着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不平等程度会随之降低。分析高校扩招前后 1998~2004 年的截面数据发现,高等教育扩张优化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原来高等教育机会相对偏少的地区增加了供给,而在原本高等教育较发达的地区则增加较少,进而使整个教育机会供给和教育机会需求相互匹配(文雯,2010)。此外,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过程中,地方院校为保证生源质量,会尽量扩大外省生源,这有利于提高过去入学机会较低省份考生的入学机会,进而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省际差异(阎凤桥,2012)。因此,总体上各省之间的教育不平等程度在下降(刘精明,2007)。同时,有学者观察到,扩张政策使女性上大学的机会显著增加,进而促进了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邢春冰、李实,2011)。而且扩张之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正在从家庭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向家庭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从非农村地区向农村地区延伸(张兆曙、陈奇,2013)。最后,可以得出结论:高等教育扩张通过促进教育公平进而促进了社会公平。

2. 减少收入不平等。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扩张减少了收入不平等。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高等教育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既有消极的扩张效应(不平等扩大),也有积极的抑制效应(不平等减小)。在追踪了 49 个国家的跨国数据后,赖德胜(1997)发现,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一条库兹涅茨倒 U 形曲线。在教育扩展初期,收入不平等呈扩大趋势,而当处于教育扩展后期,收入不平等则会缩小。

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扩张推动了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较快增长,这将导致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对提高与财产收入份额的相对下降,从而使得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更趋平等(陆根书,1998)。同时,也有学者提出,目前中国的教育扩展水平已跃过倒 U 形曲线的拐点(孙百才,2009),因为高等教育扩张在降低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同时,可以培养更多高技能的劳动力,从而强化教育扩张的抑制效应,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徐舒,2010)。杨俊等(2008)采用中国省级 1996~2004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转型期的中国,教育扩展有利于教育和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最后,可以得出结论是:高等教育扩张通过减少收入不平等进而促进了社会公平。

(二) 反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损害了社会公平

1. 恶化教育公平。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扩张给不同地区、不同家庭条件的孩子带来的入学机会是不一样的。就上大学的机会而言,不同人群并没有均等地从扩张政策中

受益。东部地区、城镇家庭显然受益更多,而少数民族的女性、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受益较少(邢春冰、李实,2011);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新增受教育机会更多地被那些父亲阶层地位高、家庭经济条件好、拥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所享有(杨奇明、林坚,2014)。这一方面可能源于教育资源在地区间分配不均,另一方面可能是学费上涨导致贫困家庭面临更强融资约束的结果(Wang等,2007)。李春玲(2014)利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并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别之间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反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并指出扩张政策不仅增加了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在数量上的不平等,还增加了其在质量上的不平等。另外,弱势群体在2000年的相对受教育机会比10年前更少了(吴晓刚,2009)。因此,可以认为,高等教育扩张通过恶化教育公平进而损害了社会公平。

2. 加剧收入不平等。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有学者认为,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日益扩大。原因在于教育扩张过程中:(1)教育分配不平等使教育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差过大;(2)过度教育引致就业难并降低了已就业者教育回报率;(3)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二元分割和“关系网络”(毛建青、李晓兰,2014)。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倒U形曲线顶点的左侧,由于教育供给小于教育需求所导致的不同水平教育者之间工资差距扩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白雪梅,2004)。虽然扩张后高等教育平均回报率上升,但这种好处更多地被高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所享有(Anning等,2015)。因此,大学毕业生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深了。方超、罗英姿(2016)基于1996~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张扩大了教育基尼系数,并进一步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等。可见,目前中国教育扩展对收入差距的扩张效应仍占据主导地位(杜鹏,2005)。因此,高等教育扩张通过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平。

总体而言,在高等教育扩张是否促进社会公平这个议题上,争论主要围绕扩张政策是否促进教育公平和是否减少收入不平等这两个子议题展开。在第一个子议题上,正反双方在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上存在争议,而在性别和阶层方面,双方似乎达成了共识,即扩张减少了阶层之间的教育公平,而促进了性别之间的教育公平;在第二个子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其分歧的实质在于扩张政策处于教育扩展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顶点的哪一侧。认为扩张政策发生在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顶点右侧的正方肯定扩张政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抑制效应,持对立观点的反方则承认扩张政策给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扩张效应。造成上述重大分歧的关键,本文以为,在于双方实证方法上的偏漏:(1)选择的样本长短不一;(2)数据的处理存在很大的自主性;(3)模型设定的偏误。因此,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厘清高等教育扩张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乃学界

当务之急。综合正反两方观点,本文提出,高等教育扩张促进了教育公平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总体上则损害了社会公平。

四、关于人口红利的争鸣

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唐代盛、邓力源,2012)。穆光宗(2008)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而教育扩展通常被视为实现此二者的主要手段。依此逻辑,始于1999年的高等教育扩张有助于增进中国人口红利。对这一命题,学者们做了大量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例如,樊奇(2013)利用江苏1999~2011年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后,江苏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朱福林(2010)却提出,在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外溢效应并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可见,这一命题本身并未在学界得到一致认可。而围绕其展开的相关争辩却席卷整个学术界。

(一) 正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增进了人口红利

1. 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正方提出的第一个立论根据。有学者认为,教育可以直接增加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具体表现为教育赋予劳动者更高的生产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钱雪亚,2012)。因此,更高的教育水平将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高等教育扩张使更多的人接受到良好的教育,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而这些高素质人才早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王宇、焦建玲,2005)。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大幅上升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力资本规模空前扩张(陈斌开、张川川,2016)。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实施将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低级劳动力市场过度拥挤的矛盾,从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发展,而且也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改善整个社会的劳动边际产品(朱镜德,2003)。长期而言,作为知识和技术进步的载体,人力资本将对后续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肖志勇,2010)。因此,高等教育扩张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进了人口红利。

2. 推进人口城市化。正方的第二个立论根据即为高等教育扩张推进了人口城市化。他们认为,教育的扩展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内在地要求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赖德胜,2013)。通过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有学者实证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加剧了大学生向大中城市的人口迁移,这导致以高人力资本人口空间集聚为显著特征的城市化(张超等,2015)。有研究发现,与高校扩招前的1992~1998年相比,1999~2013年高校扩招政策对人口城市化增长率的贡献为2.7%(初帅,2016)。而房价无疑是揭示城市化进程的一个较好的显性指标。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安家立业,城市房价随之水涨船高。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房价上涨最甚(张传勇、刘学良,2014),因为这些自由

流动的大学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和住房的刚性需求。从长期看,通过要素在空间上的再配置,促进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引致了大规模的城市需求,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1)。因此,高等教育扩张通过推进人口城市化改善了中国人力资源的空间配置结构,使中国人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开发,从而进一步释放了人口红利。

(二) 反方观点:高等教育扩张减少了人口红利

1. 降低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在人力资本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尽管高等教育扩张增加了人力资本存量,但同时也降低了人力资本利用效率。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高等教育扩张一方面通过增加主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加剧了大学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存在于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也阻碍了主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者在次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最终减少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机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吴要武、赵泉,2010)。可见,以高等教育扩张为典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引致社会人才供求失衡,直接降低了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大幅增加,生均教育资源不断减少,使得个体人力资本存量发生相对下降,出现贬值情况(黄维德等,2013)。另外,作为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一种有效衡量,中国创新效率也遭受到了高等教育扩张的负面冲击。具体而言,高等教育扩张虽然增加中国内地省份创新总产出,却使其创新效率损失高达 35.7%(陈林、夏俊,2015)。因此,高等教育扩张通过降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减少了人力资本积累红利。

2. 加剧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反方立论的第二个根据。梁秋生等(2013)通过考察河北省的人口数据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将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在 2000~2010 年间平均提高了 0.3 岁,年出生人口规模减少了 6 万人以上,总和生育率下降了 0.10。同时,反方也注意到,高等教育扩张后,中国各年份出生同期人口的中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在 2010 年,受益于扩张政策的适婚人口的已婚比例相比 2000 年同龄人的已婚比例显著下降(刘昊,2016)。他们进一步发现,高等教育扩张不仅推迟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群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提高了其在婚姻市场上搜寻失败的概率,进而降低了结婚率,而且阻断了家庭内部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使得出生于潜在最优家庭的人口数量减少(吴要武、刘倩,2014)。总体上,高等教育扩张通过提高社会平均初婚年龄、降低结婚率和生育率减少了中国新出生人口,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老龄化的到来,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围绕高等教育扩张是否增进人口红利这个议题,正反两方的争论主要从人力资本和人口结构两个视角展开。首先,在扩张政策是否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这个子议题上,争论的关键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幅度与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降低幅度,孰高孰低?其次,在扩张政策是否通过改变人口结构推动人力资源开发这个子议题上,矛盾的根源

是:人口老龄化(年龄结构)的抑制效应与人口城市化(空间结构)的扩张效应,孰强孰弱?本文认为,尽管高等教育扩张增加了许多新大学毕业生,但节节攀升的大学生失业率表明这些新增的人力资本并未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人口城市化效应极易受到政策环境干扰,并且考虑到人口流动性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增强这一趋势,其作用也并不显著。而扩张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却是直接的。因此,本文认为高等教育扩张并未有效增进人口红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口红利。

五、结 论

事实上,高等教育扩张政策本身蕴藏着诸多矛盾,而围绕其主要矛盾——高等教育扩张的得与失,学界出现了观点上的对立与统一。扩张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坚持两点论。同时,其“得”与“失”之间,孰轻孰重?必须抓住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从根本上认清扩张政策的本质。

通过前述讨论,可以发现围绕高等教育扩张的政策效应研究,学界出现了“三大争鸣”。(1)高等教育扩张是否有利于教育发展?围绕该议题,正方分别从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促进人才培养多元化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反方则从降低教育质量和过度教育这两个方面做出了辩驳。分歧的关键在于缺乏一个统一的教育发展评价标准。此轮交锋中,反方略占优势。(2)高等教育扩张是否促进了社会公平?围绕该议题,正反双方分别从是否促进教育公平和是否减少收入不平等这两个维度展开了辩论,而矛盾的根源在于实证方法上的偏误。总体来看,正反双方针锋相对、相持不下。(3)高等教育扩张是否增进了人口红利?围绕该议题,正反双方分别从是否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是否通过改变人口结构推动人力资源开发这两个维度展开了辩论,而分歧的实质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幅度与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降低幅度、人口老龄化的抑制效应与人口城市化的扩张效应,孰大孰小?此轮交锋中,反方占据上风。总体而言,反方声势较强,即学界对高等教育扩张政策效应持负面态度的占优。

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教育扩张政策是一次重大的公共政策实验,牵扯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教育发展等,影响深远。可见,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公共管理学的交叉学科领域。因此,研究高等教育扩张政策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学界更应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出精准的政策评估和全面的经验总结。显然,现有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具体而言,在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研究中,学界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实施的动因和目标。这是正确评估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起点;(2)高等教育扩张总体是否有利于教育发展?促进还是损害了社会公平?增进抑或减少了人口红利?这三大根本性问题有待学界进一步厘清;(3)高等教育扩张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比如,对创新、对劳动生产率和对产业转

型升级等方面的影响。在新常态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面临难题,创新驱动战略正当其时。因此,研究上述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白雪梅(2004):《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
2. 陈斌开、张川川(2016):《人力资本和中国城市住房价格》,《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3. 陈林、夏俊(2015):《高校扩招对创新效率的政策效应——基于准实验与双重差分模型的计量检验》,《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4. 初帅(2016):《高等教育发展与人口城镇化——来自中国高校扩招的证据》,《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5. 登云、齐恬雨(2016):《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人才培养》,《中国高教研究》,第4期。
6. 杜鹏(2005):《我国教育发展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
7. 樊奇(2013):《转型升级、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来自江苏的经验证据:1999—2011》,《教育与经济》,第6期。
8. 方超、罗英姿(2016):《教育能够缩小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吗?——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问题》,《教育发展研究》,第9期。
9. 高耀、刘志民(2015):《机会扩展、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公平——基于高校学生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教育科学》,第1期。
10. 谷宏伟(2009):《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投资过度:基于信号理论的视角》,《财经问题研究》,第9期。
11. 黄维德等(2013):《上海人力资本贬值的计量及其社会性成因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第8期。
12. 纪宝成(2006):《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对策》,《高等教育研究》,第7期。
13. 赖德胜(1997):《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经济研究》,第10期。
14. 赖德胜(2013):《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的劳动力市场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第1期。
15. 李春玲(2014):《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第2期。
16. 梁秋生等(2013):《高校扩招与育龄妇女生育模式的转变——以河北省为例》,《人口研究》,第2期。
17. 刘灿、宋光辉(2004):《高校扩招过程中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
18. 刘昊(2016):《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基于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1期。
19. 刘精明(2007):《扩招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4期。
20. 陆根书(1998):《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与社会平等:高等教育扩展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第4期。
21. 毛建青、李晓兰(2014):《我国教育扩展加剧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探究——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黑龙江高教研究》,第9期。
22. 缪宇环(2013):《我国过度教育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究》,《统计研究》,第7期。
23. 穆光宗(2008):《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24. 钱雪亚(2012):《人力资本水平统计估算》,《统计研究》,第8期。
25. 乔锦忠(2008):《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教育学报》,第5期。
26. 任丽婵(2011):《我国大众化以来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对毛入学率的贡献研究》,《中国高教研究》,第7期。
27. 尚明彩、丁辉(2010):《论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所获得的支持资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第s1期。
28. 孙百才(2009):《中国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研究》,《统计研究》,第12期。

29. 唐代盛、邓力源(2012):《人口红利理论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第3期。
30. 王宇、焦建玲(2005):《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管理科学》,第1期。
31. 文雯(2010):《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资源布局的实证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第4期。
32. 吴晓刚(2009):《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社会》,《社会》,第5期。
33. 吴要武、刘倩(2014):《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剩女?剩男?》,《经济学(季刊)》,第4期。
34. 吴要武、赵泉(2010):《高校扩招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经济研究》,第9期。
35. 肖志勇(2010):《人力资本、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财经科学》,第3期。
36. 邢春冰、李实(2011):《扩招“大跃进”、教育机会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经济学(季刊)》,第4期。
37. 徐舒(2010):《技术进步、教育收益与收入不平等》,《经济研究》,第9期。
38. 阎凤桥(2012):《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分析》,《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第0期。
39. 杨俊等(2008):《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1期。
40. 杨奇明、林坚(2014):《教育扩张是否足以实现教育公平?——兼论20世纪末高等教育改革对教育公平的影响》,《管理世界》,第8期。
41. 杨文奇(2006):《劳动力市场与大学生就业——过度教育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教育发展研究》,第15期。
42. 叶晓阳、丁延庆(2015):《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社会》,第3期。
43. 余华义、陈东(2006):《高校扩招、毕业生就业难与“人才高消费”》,《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44. 岳昌君(2013):《毕业生就业难的影响因素与趋势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第22期。
45. 张超等(2015):《高校扩招、人口迁移与房价上涨》,《南方经济》,第12期。
46. 张传勇、刘学良(2014):《高校扩招对房价上涨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47. 张军利(2010):《“过度教育”:劳动力市场视角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研究》,第9期。
48. 张彦通、赵世奎(2004):《过度教育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国高教研究》,第12期。
49. 张兆曙、陈奇(2013):《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50. 张卓、徐峻(2015):《高校扩招如何影响大学毕业生收入——基于CHI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南方人口》,第5期。
51. 赵婀娜(2016):《高教质量“国家报告”》,《人民日报》,4月8日。
52. 赵立卫(2005):《非人力资本积累追求:大学生就业难的新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53. 赵凌(2012):《十年扩招对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教育与经济》,第2期。
54.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1):《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11期。
55. 钟秉林、赵应生(2007):《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教育公平的重要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56. 朱福林(2010):《中国高校扩招外溢效应实证研究》,《高教研究》,第1期。
57. 朱镜德(2003):《高等教育强劲扩张对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58. Anning H. and Jacob H.(2015), Increasing Heterogeneity in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2(3):322-330.
59. Wang X.J., et al.(2007),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and Inequality: The Chinese Experiment. IZA Discussion Paper. 4030:3-44.

(责任编辑:朱 犁)